

人民政协应重视文化统一战线工作

◎ 余源培

【摘要】文化统战作为中国共产党统战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对中国的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将文化统战纳入人民政协的总体格局之中,对于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对于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都很有必要。

【关键词】文化统战 形势、任务和基本原则

作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除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统一战线,还有文化统一战线。然而相比较而言,人们对于文化统一战线(简称“文化统战”)却显得不够重视,政协工作中也存在这个问题。故此,本文对政协如何加强文化统战工作,提出一些基本观点和原则性思路,以期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文化统战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统战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在艰难复杂的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有一系列的论述。《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论》则堪称是经典之著,集中了党有关文化统战的最重要思想。毛泽东强调指出: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又有半封建文化,它们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与这种反动的文化同盟相对抗,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1]他对文化统战问题上的偏向进行批评,提出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路径。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说明,没有文化统一战线的统一战线是不完整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文化统战对于 21 世纪中国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这是因为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其背景就是从“综合国力”到“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的提出。人民政协的工作必须强化这种世界历史

眼光。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次将综合国力区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所谓“硬权力”，指靠经济和军事实力支配的力量。“然而，除此而外，还有一种间接运用力量的方法”，表现为“同化式的实力”，特点是“使人随我所欲”，这就是“软实力”，主要“来源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1]其核心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创新能力。1993年哈佛大学另一位教授亨廷顿发表文章，把全球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称作文明冲突的时代。亨廷顿引用捷克总统哈维尔的话说，“今天，文化的冲突愈演愈烈，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危险”；他还引用欧盟前主席德格尔的话说，“在后冷战的时代的世界，文化同时拥有分裂和聚合的力量。因为意识形态而分道扬镳的人民，却因文化而凝聚在一起”；“因意识形态或历史环境而结合在一起的国家，也会分裂或内部关系紧张。”为此，亨廷顿举出前南斯拉夫分裂和波黑地区的战乱、前苏联许多地区的民族和宗教纷争为例，得出结论说：“文化认同是决定一个国家敌友的核心要素”。^[2]约瑟夫·奈在2004年出版《软实力——国际政治的制胜之道》一书，正式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特指一个国家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动的能力，其力量源泉是基于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认同感而产生的亲和力、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

“文化软实力”的提出使得文化统战显得尤为重要：

其一，这是我国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实现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人民政协的工作千条万绪，归根到底是要服务好这个最大的政治。但是对于什么是新时代的现代化、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我们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的。最初我们概括为“四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基本上指的是提高国家的硬实力。这还是传统发展观所理解和要求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新时期人民群众对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空前增长。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意味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必须重视文化的社会功能。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一个与之相称的现代中国文化，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无法奠定的，没有文化的崛起是很危险的。这应当是人民政协开展新时期文化统战工作的现实立足点。

其二，这是在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获得主动权的需要。现时代国际“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国的发展战略都高度重视软实力建设，文化则是软实力的核心，

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取得主要权。这可以从三个层面认识：（1）文化与经济建设存在着互激作用。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在现代经济中文化因素越来越重要。例如品牌现象，就是经济具有文化特性的表现。它虽以非物质形态存在，却可以反复地转化为物质财富。一个国家，当文化表现出比物质和货币资本更强大力量的时候，当经济、产业和产品体现出文化品格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才能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创造财富的更高能力。文化创新已经日益成为经济价值创新的关键所在。（2）文化与政治建设存在着互激作用。在传统的国家统治中，主要是依靠强制和暴力。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强调治理、强调“善治”，除继续保持强制和暴力功能之外，更加重视“社会认同”的“合法性”。在这种态势下，某种文化有可能“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3]“人民和民族都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4]回答这个问题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键。一个没有文化核心的社会是难有立足之地的。孟子说：“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5]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倡导公平正义、推进民主政治，这些都迫切需要文化的引领。（3）文化的育人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汉代思想家刘向将“文”与“化”相结合，明确提出“以德化人”的主张。培养同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潜在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到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以文化人”需要通过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来实现。

其三，这是开拓统一战线深度和广度的需要。爱国统一战线是实现广泛团结，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实现统一，完成新时期总任务的重要保证。“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6]解决我国新时期新阶段面临的复杂矛盾和问题，不能只靠政治和经济手段，还需要重视文化的独特功能。文化统战对于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先进文化创造社会核心价值观，提供构成共同理想、共同信念、共同道德的文明基石；先进文化凝聚民族精神，是沟通海内外、海峡两岸的“心灵之桥”，为56个民族营造共同的“精神家园”；先进文化推动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协同发展，催生社会和

谐。从根子上说,统一战线是做团结人的工作,是做争取人心的工作。统一战线与文化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内在要求重视文化统战工作。

新时期新阶段我国文化统战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重视不断提高。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东发生的剧变相比较,可以有信心地说,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我国的文化建设确实经受着一系列严峻的考验,对此应当有深重的忧患意识。

(1)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在全球化各种思想文化交错和激荡的格局中,西方文化居于“霸权”地位,控制着“话语权”。苏利文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指的是来自发达国家与支配者利益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观点的商品、时尚或生活方式等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创造出某些特定的需求或消费形态,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主要是西方)文化侵害、取代或挑战,受支配程度越来越高”。^①西方国家拥有 90% 的网络这一优势,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提供了场所。在这方面中国处于劣势,迫切需构建文化统一战线来应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

(2)市场经济对文化的负面影响。市场经济在给我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活力的同时,它的负面效应逐渐显露和放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活动越来越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共识、秩序和意义的缺失。到那里去寻求“共通感”?格蒙·鲍曼指出:“生活总体上的私人化”,是近代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在我们私人化的社会中,不满似乎指向不同的方向,甚至彼此冲突,它们极少累积并凝聚成一个共同事业”,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原子式的个人,成为无家园之感的“异乡人”。^②市场经济还会诱发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导致“三俗文化”泛滥成灾。我们急需通过文化统一战线来构建和保护“精神家园”。

(3)对文化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性认识不到位。表现为:只关心文化的工具价值,不重视文化自身的目的;只强调文化为经济和政治服务,忽视文化的相对独立地位和独特价值;只追求文化功能的急功近利,不尊重文化特有的潜移默化性、渗透性、历时性和精神性特点。这些认识上的不到位,使得我国取得的文化成就与经济成就

显得很不相称。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思想解放,用新观念来开展文化统一战线工作。

认识现状是为了更好开展工作。我国正处在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文化将是什么样的文化,它的主要内容和任务又是什么呢?(1)这种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要面向现代化,强调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文化要通过思想、人才、素质等渠道,正确引领我国现代化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要面向世界,强调文化建设不仅要着眼于中国,而且要放眼世界。新时期的文化统战,要结合我国国情,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文化要面向未来,强调文化建设不能急功近利,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可持续发展。(2)这种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中国文化只有首先赢得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科学的,倡导文明、反对迷信愚昧;无论是对待外国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要有科学的态度,决不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大众的,即属于人民大众,因而又是民主的,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3)这种文化是先进的、和谐的、中华的。这是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先进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和谐的,培育文明风尚,为全体人民团结进步提供精神支撑;中华的,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以上三方面从不同角度和层次,说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特征、内容和任务。构建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仅需要人民政协文化统战的积极参与,而且成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

人民政协开展新时期文化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1)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发展到爱国统一战线,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关键是创造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文化统战要在保持我国

文化的健康和谐生态中,在保持一元与多元之间必要的张力上多做工作。否认多样性也就无需指导的一元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既不能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放任自流,也不能追求“舆论一律”的绝对统一,只能采取在尊重差异中扩大文化认同,在包容多样性中增进文化共识。文化统战在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2)坚持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统一。文化的独特功能能帮助社会的人解决“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定”问题,从文化认同中获得一种“共同家园”的亲切感。这里存在着一个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文化,我们应当发挥的首要作用是国家认同;而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则极力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分离,相对立,以所谓“保卫民族文化”为旗帜,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今天文化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十分重要,我们要用国家观念淡化民族界限、宗教界限、地区界限,这就需要发挥爱国主义,提高对国家的整体归属感,对国家的自豪感、向心力,形成“多元一体”下的“一国”“一心”。文化统战应当关注这个重要问题的正确解决。从历史上看,正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良性统一,使得中华民族具有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这种情况是不同于欧洲国家的。欧洲作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地,追求的是建立“民族国家”,其理念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中国的情况与欧洲不同,志士仁人们都倡导中华民族的整体民族意识。为此,应当防止“文化自体主义”,表现为纷纷强调本民族、本地区文化的重要性,甚至将本文化自成一体或自发一源,标榜其对其他文化的正宗性、唯一性和排他性。这客观上不仅助长了地方主义,而且会导致宗教狂热和民族分裂。应当在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重视文化统战的积极作用。

(3)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的独特功能是凝聚力。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两面旗帜。坚持这两面旗帜的统一,就能牢牢地把握民主和团结两大主题,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爱国主义深刻地凝聚着每个人对祖国的血肉依存关系,它是集体主义在处理个人与国家关系上的体现,是把各民族维系团结的纽带,是对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至高无上的感召,是中华民族赖以独立、生存、统一、发展、繁荣的内在动力。在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强调:“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而使全体中华

儿女都“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0]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虽有区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是爱国主义的最高产物。中国人民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对于港澳、台港、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否则就不能叫做爱祖国。

(4)坚持传统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现代性。”^[11]文化具有历史性、恒久性、承继性,它不可能人为中断;文化又具有流动性、发展性、碰撞性,它不可能固定不变。在全球化加快的情况下,一方面需要坚持中华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又要克服文化封闭,在正确处理“同质”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关系中,赋予中华文化以时代性和创新性。真正爱护优秀文化传统,就必须将其存活于时代的前进步伐之中。如果对传统文化不做具体分析,将其中封建糟粕当作精华,甚至主张全盘复古,那么,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就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阻滞力。在现阶段,“文化统战”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建设“祖国文化”。它两个主要渠道:一是民族、地区文化之精华;二是世界文明之精粹。对外来文化宜有开放兼容、海纳百川的胸襟。

(5)坚持国内文化统战与海外和国际文化统战的统一。在完成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中,文化统战亦有可为。祖国对台湾地区的影响力,虽然取决于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但归根结底取决于文化实力。文化的影响力更具有本根性、渗透性、深刻性。海峡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和最终的和平统一,不能只靠物质层面,经济固然重要,但却不能代替两岸的文化交流与思想沟通。两岸在共同促进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交流中,必将增进和深化两岸的共识。文化是民族之“根”和“本”,文化交流和融合能够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

在开展海外侨胞和海外华人的团结中,文化统战必不可少。现在地球村的交往更加频繁,流动中的社会人普遍出现文化寻根意识、文化认同意识的加强,海外侨胞和海外华人迫切需要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譬如,我国在海外开办孔子学院受到欢迎,就是适应了满足海外侨胞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需求,更好地帮助他们安身立命,更好地建设海内外华侨的报国文化。

在宗教对话中,文化统战应当更好开展。宗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整合得好坏直接影响到世界和谐。可以

从宗教的文化功能入手,用文化战线缓和各种矛盾。1955年3月,毛泽东和达赖喇嘛谈话时指出:“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1]为了搞好宗教统战工作,1963年年底,毛泽东专门批示:“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素食影响到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不研究宗教,“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2]因此,在开拓国际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空间上,我国需要发挥文化统战的作用。

在构建和谐世界中,文化统战作用重大。据统计,现在全世界大约有190多个国家,63种宗教,6700多种语言,至少有几百甚至上千个民族。如何进行相互交流,文化成为沟通的桥梁。要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对抗。要学会用文化统战来反对文化霸权,使文化可以成为人与人心灵和情感沟通的桥梁、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各种文明之间相互交流和借鉴,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在当今世界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大背景下,将文化统战自觉纳入人民政协的总体格局之中,对于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上新台阶很有必要,对于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很有必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很有必要。文化统战的特点是“柔性原则”(潜移默化)和“对话原则”(和而不同),它同人民政协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不谋而合。文化统战不仅是文化人的事情,还需要党和政府从整体上高度关心。

(作者: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杨国军)



注 释:

[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2]约瑟夫·奈:《美国定能独霸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60页。

[3]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台港联经出版社1997版,第65页。

[4]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6]见《孟子·公孙丑上》。

[7]江泽民:《统一战线在新世纪党的工作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页。

[8]转引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9]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页。

[10]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9页。

[1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12]转引自《今日中国佛教》,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

[13]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90页。